

【艺文丛谈】

# 从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看圣经诠释的堕落与拯救

程小娟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批评方法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者期望通过新的方法触及《圣经》真实以获取新的意义。然而方法的不断变换也正揭示出人自身的限制，使圣经诠释不断面临困境。人们无法获得《圣经》原初的、确定的意义，却不断地在自身的参与中产生出多元的意义，继而在其中寻索上帝。从无法确认上帝原意的意义上讲，圣经诠释是一种堕落，而从人“处于限度中”的存在境况而言，诠释又是探索上帝话语、获取自我拯救的希望所在。多元诠释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学者应以谦虚的心态并积极参与到诠释中去，在新的境遇下，携手走向拯救之途。

关键词：圣经；西文文学；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371.0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07)03-0053-04

《圣经》内部就有不少诠释事件，成书后的流传过程更是不断诠释的历史。《圣经》内部的诠释事件伴随着《圣经》中人类历史的堕落与拯救，流传史中的诠释同样伴随着绝望与希望。

《圣经》中的人类堕落故事始自对上帝话语的首次诠释。起初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时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sup>[1]</sup>《创世记》2:16 这个话语被转述了三次。<sup>①</sup>第一次是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sup>[1]</sup>《创世记》3:1 第二次是女人回答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sup>[1]</sup>《创世记》3:2-3 第三次是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sup>[1]</sup>《创世记》3:4-5 这三次转述显然是蛇和夏娃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理解所做出的解释，每一次转述都是对上帝原意的偏离、歪曲或附加了转述者自己的意愿。其中第三次，蛇更是为成功引诱重构了上帝的意图。夏娃此时也许已经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上帝的真实意图，在迷惑中接受了蛇的解

释，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拿给亚当吃。后果是，夏娃、亚当和胜利的诠释者蛇都受到上帝的诅咒，被赶出乐园。

而《新约》中，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间拯救人类。他一生的教导也伴随着对《旧约》的诠释，以便其门徒和众人更好地理解律法和上帝的意图。进入使徒时代，门徒四处的宣讲更是对耶稣教导的天国信息的诠释。福音书中反复说，耶稣总是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sup>[1]</sup>《马太福音》13:34 这些比喻只有门徒才明白而众人不能理解：“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sup>[1]</sup>《马太福音》13:11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门徒的诠释，耶稣教导中包含的救赎信息才能彰显给这个世界。

诠释事件似乎成了圣经诠释历史的隐喻，对上帝话语的诠释一开始就被抛入一个误解或扭曲的状态：上帝不再作声，只有人在不断地言说上帝的话语，却不知上帝说的到底是什么。回顾历史，不乏圣经诠释的分歧导致的神学和教义的冲突，也不乏由此引起的教会分裂和教派林立。在诠释者的手下，似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卷书都可能有不同的诠释。即如《雅歌》，数世纪来曾被认为是寄寓了基督与教会或信徒之间的相互关系，或预表了耶稣基督将与外邦人联合，或仅仅是

① 严格来讲是被转述四次，上帝吩咐亚当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造出夏娃，因而夏娃应当是通过亚当的转述知道这些话的。圣经没有明述，这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

收稿日期：2006-10-08

作者简介：程小娟(1977-)，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生。

描述世俗爱情,或间接地表达了对异族神祇的崇拜等等。<sup>[2]</sup>综观西方圣经文学批评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圣经诠释所遭遇的限度与困境、危机与希望,从而激发深入的思考。<sup>[3]</sup>

## 二

在《圣经》被视做字字句句都是上帝启示的话语、绝对不会有误的时代,圣经诠释就已经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文艺复兴时期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复兴,使牧师们在拉丁文《武加大译本》之外又接触到希伯来文《圣经》和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多种文本的差异引发了文本鉴别研究,打破了《圣经》字字都是神圣启示的信仰,人的因素开始引入圣经,于是一种疑惑产生了:“上帝岂是真说……?”那么上帝到底说了什么?文本鉴别家分别根据自己的一套诠释标准,对不同抄本和译本进行比较和鉴别并作出选择,试图努力恢复上帝话语的原来面貌。然而这种恢复过程本身又充满了争执,鉴别者的神学观念、学识、鉴别方法和标准,掌握材料的限度都会影响鉴别结果。这种恢复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诠释的一种。

文本鉴别带来的疑惑扩展到了对各卷书的作者、资料来源、写作日期、著作背景、写作经过和文本意义等的质疑。为了获得“真相”,学者们殚精竭虑地对这些方面重新一一考证,从而形成了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圣经》研究的繁荣。由于侧重点和具体方法的不同,研究中逐渐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其中较为卓著的方法有来源批评、形式批评和编修批评。

来源批评者从《圣经》文本中的重复、矛盾、断裂、风格和用词等差异出发,认为《圣经》不是一个统一的文本,而是有人按照当时的需要,将不同来源的材料加工、编辑而成,因而研究者需要将不同的材料来源分解出来,再一一确认各部分材料的作者身份、写作年代、风格、背景和意图,<sup>[4]35-36</sup>如此才可能接近《圣经》原作者的意图。

早在1753年,阿斯特鲁克就对《创世记》材料进行了重组。19世纪,来源批评得到充分发展。艾克浩恩在阿氏基础上将《创世记》1-12章的材料分成Jahweh和Elohist两种来源。此后学者们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假说,但都不能令人信服,不过关于五经材料来源的一些基本说法逐渐成型,最

后由威尔浩森加以系统阐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五经来源“J、E、D、P”四底本说。《新约》尤其是福音书同样被切割成不同的碎片,被认为来自不同的原材料。1804-1827年间艾克浩恩出版《新约导论》提出了福音书两种来源的假说,此后霍兹曼确立了“二底本说”,斯特瑞特在1911年进一步提出了符类福音有四种材料来源的假说,分别是《马可福音》、Q、M和L。

从表面看,来源批评似乎有助于人们回到更古老的文本,更接近《圣经》原意,仔细推敲却又让人怀疑,因为其批评标准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之上的:假设作者在写作中所持的观点和所用的术语都具有一贯性,因而,文本中任何地方出现的显著不同都被视作被整合进文本中的其它来源材料的标志;假设单一作者在其作品中不会编入矛盾的材料,因而文本中的矛盾被看作是许多人合作完成文本的证据;事件顺序的打破和思维进程的阻断被看作不同作者的作品被后来的编修者组合在一起的证据;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及故事内部的重复被看作当前文本形式下隐含了不只一个作者的进一步证据。于是,文本风格、语汇、观点的多样性,同一篇章或不同篇章中的矛盾或不一致,中断篇章统一性的突然障碍及各种各样的复写与重复,就被来源批评者看作确认文本背后书写材料的标准。<sup>[4]37</sup>

形式批评不满足来源批评的结果,试图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继续追溯,以寻找《圣经》文本各个小单元更久远的口头传统。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文学单元的内容、形式和功能确定其文学类型,并通过重构这些文学类型产生的生活背景,将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和初期教会生活中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图,并以此为线索了解初期以色列人的生活和历史。因而,研究者致力于将《圣经》文本的一个个单元进行类型分析。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德国学者袞克尔对《创世记》和《诗篇》的研究,以及布尔特曼的符类福音研究。袞克尔试图通过对文学单元的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找回原初的故事并建立起传说的内在历史;布尔特曼同样设想通过层层剥离获取每种类型最原始的形式,恢复传统的本来面目。但是细致地分类分析之后,布尔特曼对研究耶稣生平历史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产生了严重怀疑。耶稣的故事和言论已被早期教会加以修

改,恢复原始面貌几无可能,形式批评所能作到的只是向真正的耶稣故事和言论迈进一步。

布尔特曼的发现颇有意味,一种从怀疑出发试图找到原初之“真”的研究最终却回到对自身的怀疑。正如亨德教授在《新约之解释——1900-1950》中所说:“我们决不可忘记,一个故事所采用的形式,永不能告诉我们,这故事的本质是真是假。形式批评的全部方法实在过于主观,太多臆测,因此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确定的指导。”<sup>[5]</sup>而形式批评正是开始于对《圣经》文本中包含的后人附加于其上的主观内容的怀疑。

也许是出于对形式批评的失望,编修批评者把眼光从遥远的古代稍稍收回,关注那些把资料收集编纂起来的人的意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鲍恩凯姆、康西曼和马克森三位德国学者通过福音书之间及与其他平行材料间的文本比较,推测某一卷福音书作者的写作意图。在希伯来《圣经》研究方面,瑞德1938年出版的《六经的形式批评问题》和诺斯1948年出版的《五经传统的历史》是运用编修批评的重要著作,揭示了五经形成中各种材料编辑背后的神学思考。

编修批评者似乎少了几分对文本真实性的叩问,多了几分对文本当下形式的肯定,以此来寻求当下文本作者或编者的意图,而不是追溯更古老资料作者的意图。这种视角的转移也可视作失望之后的重新寻找。20世纪中期以后,编修批评的这种迹象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在各种世俗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人们不再关注文本背后的历史问题,而是将兴趣转移到文本自身,默认当下形式《圣经》文本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同时也意味着《圣经》文本作者重要性的削弱和话语自身重要性的凸显。批评家相信,文本可以通过自身的机制显现意义,解释者要做的就是通过细致地分析文本揭示其意义。

### 三

较早进入文本自身研究的是奥尔巴奇的《摹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描写》和弗莱的《批评的剖析》。1968年缪伦堡在《圣经》文学学会年度会议上发表《超越形式批评》<sup>[6]</sup>论文之后,以文本为中心的《圣经》诠释蓬勃发展。罗伯特·卡雷、爱德蒙·里奇等人将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

主义理论引入《圣经》诠释,发掘《圣经》叙事中的深层结构模式。奥特和斯腾伯格等人在《圣经》叙事学批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试图通过细读文本,分析结构布局、人物描述、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语言技巧等艺术表现手法,来确立文本内部各种信息是如何引导读者确定文本意义的。特别有意思的是,被来源批评看作是缺陷的矛盾、重复在叙事批评者眼里成了作者有意为之的独特叙事手法,蕴含深层意义等待读者去发掘。

文本中心的《圣经》批评已经悬置了作者,赋予文本以主体性。然而文本能否拥有真正的主体自由和独立性,以及解释者应如何对待这种自由和独立性是要慎重考虑的。结构主义方法试图把《圣经》文本归化到一个统领一切文化的深层结构模式中去,忽略了《圣经》文本自身思想内容的价值。<sup>[7]</sup>它实际上剥夺了文本的独立性,使文本存在的意义依附于一个更大的结构。而由于文学语言自身的惯性和模糊性,叙事学批评如过分专注于文本自身,不考虑语境因素,则很容易出现意义的飘忽不定,或出现令人迷茫的多元意义。作为主体的文本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哪一个解释者都难以穷尽对这个主体的认识,而只能是认识其中的一部分,发现和选择多元意义中的某一种或几种,这与读者自身难以摆脱的前理解密切相关。

如此,解释者的主体性便会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圣经》批评家开始将读者中心的批评引入《圣经》文学批评尤其是叙事作品的批评中,并逐渐重视它。90年代以后这类研究越来越多。大多数关注读者的《圣经》学者在赞成文本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同时,公认文本需要读者去填补其“空白”和“断裂”。这就使解释者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而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圣经》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特定身份的读者解释,或从特定目的、意图出发的解释。读者主体性的崛起,以及接受理论对读者解释合法性的确认加速了意义的生产。尽管接受理论也试图解决解释的随意和混乱,以及意义的相对主义问题,但成效并不显著。而解构主义更是为意义的多元提供了理论依据。

### 四

从历史批评到文本中心、读者中心和后现代

的多元,我们可以把《圣经》诠释看作不断放弃或不断寻找和完善的过程。它既是不不断的背离,也是不断的接近,其中交织着人的自信与自我怀疑。历史批评者对《圣经》可靠性的怀疑正是理性主义时代人的信心膨胀下的壮举,研究者相信可以通过实证的研究探索到真相,寻索到位于源头的惟一的真实和意义,但他们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梦想。文本中心的转向放弃了历史的追溯转向对文本自身的探索,但仍然无法得到一个确证的答案。向读者中心的转向意味着不再寻求一个客观的意义,而是寻求对生存个体有价值的意义。这意味着多元意义解说的出现,也意味着个体在面对多元意义时可能产生惶惑。也许人类需求安全感的本性更能激发对确定性意义的需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意义多元化。

对多元的认可不仅是因为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还出于人对自身限度的清醒认识和最高真实面前的谦卑。伊甸园的堕落让我们认识到人们解释中隐含的危险,福音中的拯救信息又让我们看到人们解释中隐含的生命希望。一种解释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手段获取霸权地位,但我们不知道它引向的是死亡还是拯救。如果伊甸园中有天使的另一种解释,也许夏娃不会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多元意义是人的退却,是有限的人面对无限的绝对的无奈和堕落,但它同样是堕落之后的人类重新获救,重新走向至高的绝对意义的希

望。多元的意义有时可能让我们不知所措,但多种声音的聆听正是我们接近永恒生命和拯救的保证——在人类自身的限度之中。这是另一种安全感的需要。

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人们已经不可能再保守《圣经》一元的诠释。对学者而言,多元诠释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这挑战未必就是异端,也许恰好是上帝意图的透露。既然无法确认上帝言语的意义,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不断言说和聆听。

#### 参考文献:

- [1]《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
- [2]梁工.西方圣经批评概览[C]//梁工.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7.
- [3]程小娟.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略[C]//梁工.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5-136.
- [4]Steven L Mckenzie, Stephen R Haynes. To Each its Own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Criticis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M]. eds.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 35-36.
- [5]周天和.《新约》研究指南(增订本)[M].香港:崇基学院神学组教牧事工部,1998:98.
- [6]James Müilenburg. Form Criticism and Beyond[J].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68, 88: 1-18.
- [7]李忠敏.形式批评与圣经研究[C]//梁工.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56.

## Thinking about the Fall and Salvation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rough the History of Bibl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West

CHENG Xiao-juan

(Literary School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To some degree, the history of bibl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West is a history of a continually renewing method of criticism. The scholars hope to grasp the truth of the Bible and find new sense from it by new methods. But the continually changing of the methods just show the limit of human being. Just because of this limi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constantly encountered rattrap. One can't gain original and certain senses of the Bible, but can only produce poly-meaning by taking part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n look for God from the poly-mea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s a kind of fall from the sense of that can't decide the original sense of God. But it is also can be regarded as a hope of searching for the words of God and obtaining self-salvation from the plight of "existing in limit". Poly-interpretation are both challenge and chance. Biblical scholars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with humility and join in them actively, walking on the way to salvation together in the new status.

**Key words:** Bibl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literary criticism